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资助现状、困境与赋能

——基于德国、美国的比较分析

李本云

（浙江工业大学 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大力推进中等职业教育离不开强有力的资助作保障，现阶段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资助规模在波动中不断增加、覆盖面及生均资助额增幅波动中呈下降趋势、资助类型以国家奖助免为主、资助主体实际以政府为首。我国在投入额度、资助类型、评定方式以及主体参与上面临诸多困境。通过与德、美两国进行对比分析，新时代背景下，应该加大政府投入、丰富资助类型、健全评定方式、统筹资助主体、完善资助法律，促进学生资助工作高效运行，助力推动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关键词：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资助；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290（2022）0033-0046-08

一、问题的提出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等职业教育（以下简称“中职教育”）是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根基，是对接区域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复工复产的有力抓手。而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资助（以下简称“中职生资助”）良性向好发展有助于推动中职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提高其办学质量和吸引力；有助于优化其体系结构、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有助于促进“上好学”，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1]但相比于普通高中教育，中职生资助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鉴于此，通过对中国知网SCI、CSSCI、CSCD和核心期刊进行主题筛选，经梳理，中职生资助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在资助现状与问题研究上。中高职资助政策自成体系、其衔接“立交桥”以及统一信息管理系统尚未建立。[2]同时，有学者指出中职生资助在政策落实上，存在使用不当，冒领和滥用问题；资金投入力度上与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灵活性较差；监督管理上出现严重断层、失职现象。[3]从宏观角度来看，中职生资助一直处于调整升级阶段，但内部结构变化缺乏一致性，需进一步优化。[4]另一方面，在资助成效

收稿日期：2022-09-16

基金项目：浙江省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职业教育服务浙江智能制造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9C35040）；浙江工业大学2019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职业教育与浙江智能制造产教融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SKY-ZX-20190716）

作者简介：李本云（1994— ），女，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学。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与对策研究方面。[5]有学者在分析中职生资助现状的基础上与德国在资助来源、标准、理念和制度方面进行比较，提出我国需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弥补政府投入的有限性；提升资助对象精准度，完善资助形式的差异性；关注学生全面发展，促进资助理念的激励性；健全资助监管法律，推进资助制度的保障性。[6]另外有学者从责任伦理角度认为政府应发挥主导责任、社会应履行支持责任、学校要做好执行责任、学生要扮演好受助者责任[7]，只有责任明确，资助的公平效率才会得以保障。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于中职生资助的现状、困境、成效及对策方面有了一定研究，但关注度仍较为欠缺，亟待进一步深入和丰富。具体表现为，研究方法单一，大多使用文献研究法，缺乏相应的统计数据做支撑；研究领域狭窄，主要集中在国内，在跨国比较方面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拟采用对比分析法，在分析中职生资助现状的基础上，与德国和美国进行对比研究，系统阐述中职生资助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优化建议。

二、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资助发展现状

我国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资，要求加快制定职业院校生均和经费标准，根据《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2021年）》显示，2021年我国资助学生人数1.53亿人次，资助投入2 668.29亿元，其中资助中职生1 796.69万人次，占总人数的12%，资助投入332.70亿元，占总金额的12.5%。其具体表现为资助规模在波动中不断增加、覆盖面和生均资助额增幅波动下降、资助类型以国家奖助免为主，资助主体实际以政府为首。

（一）资助规模在波动中不断增加

2010年以来，中职生资助金额从273.89亿元增至2021年332.70亿元，增幅仅有21.47%，而全国教育资助总投入从852.54亿元增长到2 668.29亿元，增幅高至213%，其中，普通高中教育学生资助增幅高达356%，相比之下，中职生资助规模不断扩大，但增幅过于缓慢。从年增长率来看，见表1所示，全国资助一直处于平缓增长，普通高中资助仅出现几次小幅度减少，但相比而言，中职生资助在12年间出现4次负增长，2011年和2019年增幅-18.49%和-23.74%。这体现出，国家对于中职生资助的投入仍不稳定，资助的支撑和基石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近年来，没有新鲜血液注入中等职业教育。[8]

表1　全国教育、普通高中与中职生资助额度与年增长率

（单位：亿元、%）

年份	全国教育资助		普通高中教育资助		中职教育资助	
	额度	增长率	额度	增长率	额度	增长率
2010	852.54	22.87	36	暂无	273.89	13.23
2011	979.39	14.88	94.62	163	223.24	-18.49
2012	1 126.08	14.98	93.59	-1.10	285.43	27.86
2013	1 185.15	5.25	107.36	14.71	294.62	3.22
2014	1 421.28	20	115.12	7.23	362.89	23.17
2015	1 560.25	9.78	139.28	20.99	346.18	-4
2016	1 688.76	8.24	167.5	20.26	332.13	-4
2017	1 882.14	11.45	193.8	15.70	365.29	9.98
2018	2 042.95	8.54	189.79	2.07	399.96	9.49
2019	2 126	4.07	185.01	-2.52	305	-23.74
2020	2 408.2	14.27	168.89	-8.71	318.45	4.41
2021	2 668.29	10.8	164.27	-0.03	332.70	0.04

注：根据教育部网站数据整理。

（二）覆盖面及生均资助额增幅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

我国学生资助在覆盖面和生均资助额上总体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如图1所示，第一，从资助的总人数来看，2010—2021年12年间从7 978.26万人次到15 251.68万人次，增幅91.17%。相比之下，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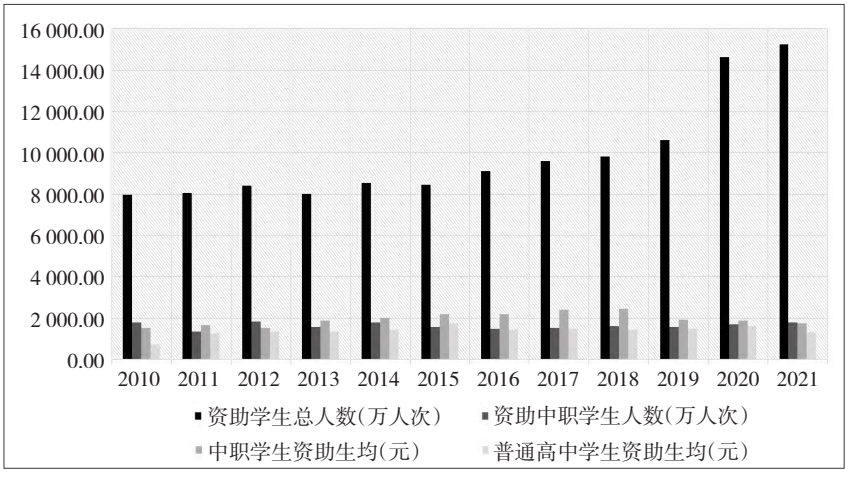

图1　2010—2021年中职生资助覆盖面和生均情况分析

注：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2010—2021年）。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2　2013—2021年中职生资助类型分析

（单位：万人、亿元）

年份	国家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		免学费		地方政府奖助金		学校奖助金		社会奖助金		顶岗实习	
	资助人数	资助金额	资助人数	资助金额	资助人数	资助金额	资助人数	资助金额	资助人数	资助金额	资助人数	资助金额	资助人数	资助金额
2013			348.88	62.21	954.40	159.07	12.87	1.58	94.62	5.36	9.09	2.48	156.92	63.92
2014			314.60	47.2	1 234.10	246.8	19.95	1.5	70.56	3.82	8.05	1.09	136.47	62.48
2015			264.90	52.98	1 050.30	210.05	21.82	4.05	77.24	4.5	6.57	0.76	146.72	73.84
2016			249.21	49.84	1 000.53	200.11	55.67	6.45	55.07	3.58	3.98	1.09	138.20	71.06
2017			254.76	50.95	998.52	199.71	87.05	6.81	31.44	2.4	3.71	1.74	134.44	103.67
2018			282.47	56.18	1 098.33	219.66	91.83	8.36	29.36	1.44	1.58	1.76	123.38	112.56
2019	2	1.19	296.32	59.26	1 161.93	232.39	99.85	9.91	29.54	1.47	3.23	0.78		
2020	2	1.2	301.47	60.29	1 194.85	239.27	149.01	12.02	54.59	3.05	6.54	2.62		
2021	2	1.2	325.91	65.18	1 253.61	251.02	147.91	9.79	59.79	2.79	7.47	2.72		

注：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2013—2021年），教育部2019年增设中职生国家奖学金，不再统计顶岗实习数据。

助中职学校学生人数，仅有2012年、2014年、2018年、2020年和2021年有小幅度增加，增幅分别为36%、13%、7%、7%、5%，其他年份均有不同程度地缩减。另外，资助中职学生人数占资助总人数比例从2010年22.3%降至2021年 11.78%，而资助普通高中人数占比从6.01%上升到8.09%。2021年中职教育招生人数高达488.99万人，而享受资助总人数仅有1 796.69万人次。这表明，中职生资助的覆盖面有所扩大，但增幅波动下降。第二，虽然中职教育生均资助额一直高于普通高中，但后者的生均资助额始终处于不断递增的趋势，12年期间，增幅高达77.44%，而前者增幅仅有14.79%，参照国际标准，我国中职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生均资助额比率远远没有达到要求。[9]

（三）资助类型以国家奖助免为主

中职教育在资助类型上呈现多样性，主要包括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免学费、地方政府和学校资助等类型，但主要以国家资助为主，学校和社会各界参与中职生资助主动性较低，比例分布不合理。见表2所示，资助类型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中职学生资助投入主要以免学费为主，投入一直保持增长趋势，2013—2021年从159.07亿元增长到251.02亿元，增长率达到57.80%，资助金额占资助总额比例从53.99%到75.45%。其中，财政资金投入占投入总额比从86.38%到98.34%。这表明国家资助在中职生资助中占主体地位。第二，地方政府资助金额占比较小，但总体呈现增长趋势，2013—2021年资助金额从1.58亿元到9.79亿元，增长率517%。这说明地方政府参与中职教育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对中职教育建设更加重视。第三，按年均资助人数来看，依次为免学费、国家助学金、顶岗实习、地方奖助金、学校奖助金、社会奖助金，2019年国家增设中职生国家奖学金，2万名学生享受此政策。

（四）资助主体实际以政府为首

多元主体参与是资助工作得以长期进行的保障，从资金投入来看，见表3所示，财政投入历年占比均超过70%，在2020年和2021年占比甚至高达98.22%和98.34%，年均投入额达280.69亿元。而相比之下，学校投入和社会投入所占比例由2013

表3　中职生资助主体投入情况

（单位：亿元、%）

年份	总体投入	财政投入		学校投入		社会投入		企业投入	
		额度	占比	额度	占比	额度	占比	额度	占比
2013	294.62	222.86	75.64	5.36	1.82	2.48	0.84	63.92	21.70
2014	362.89	295.50	81.43	3.82	1.05	1.09	0.30	62.48	17.22
2015	346.18	267.08	77.15	4.50	1.30	0.76	0.22	73.84	21.33
2016	332.13	256.40	74.19	3.58	1.08	1.09	0.33	71.06	21.40
2017	365.29	257.48	70.49	2.40	0.66	1.74	0.48	103.67	28.38
2018	399.96	284.20	71.05	1.44	0.36	1.76	0.44	112.56	28.14
2019	305.00	302.75	99.25	1.47	0.49	0.78	0.26		
2020	318.45	312.78	98.22	3.05	0.01	2.62	0.01		
2021	332.70	327.19	98.34	2.79	0.01	2.72	0.01		

注：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2013—2021年）。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年的1.82%和0.84%下降到2021的0.01%，年均投入额分别为3.16亿元、1.67亿元，投入占比非常低，且有不断缩小的趋势，资助金额在8年中分别从5.36亿元下降至2.79亿元。由此可见，中职生资助主要由财政负担，政府为主要投入主体，学校、社会参与积极性不强。由于2019后教育部不再统计企业投入情况，因而相关数据缺失，从2013—2018年企业投入额度来看，增幅达76%，但作为中职教育最大利益获得方，其参与度仍远远不足。另外，从责任划分上来看，我国虽从2005以来逐渐明确企业、学校、社会、机构参与中职生资助的主体责任，但收效甚微。

三、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资助面临困境

“政府为干，校企为枝”是德国中职生资助的最大特色[10]，其资助经费不仅充足，且一直保持着连年增长的趋势。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完备的立法资助体系是美国中职生资助的独特优势，具有资助投入额度大、覆盖面广、类型多样等特点。而我国中职生资助近年来虽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无论在投入额度、资助类型、资助评定，还是在主体参与上均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通过与中职生资助体系发展较完备的德、美两国进行对比，进而发现我国中职生资助存在的诸多困境。

（一）投入额度：总量不足，来源单一

充足的经费投入是中职生资助的基础保障，是开展学生资助工作的必要条件，而调动市场和企业的充分参与，是决定中职生资助投入的关键因素。德国中职教育的投资之所以能够保持逐年增加，其主要在于政府投入做兜底和强大的企业投入做支撑。由表4可知，一方面，德国政府提供大额的资金，其州政府提供院校日常经费等多种形式的资助，1980年各级政府资金投入达222.5亿欧元，2018年，数额高达382.7亿欧元。另一方面，德国企业以多样的方式加入中职生资助，据统计，其经费近八成来自企业，为资助工作打下坚固基础。

美国中职生的资助来源丰富，其中州政府拨款占比60%以上，根据美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19年联邦教育拨款2 444亿美元，用于中职教育的联邦资金比2000年增加了219%。[11]2018年美国颁布《加强21世纪职业和技术教育法案》决定联邦政府每年对职业和技术教育（CTE）投资12亿美元，完善的法律也保障了企业和社会投资主体的积极参与。根据美国联邦统计局在2018—2019援助年度基于5 430家机构的调查，企业援助职业学校全日制学生人数高达2 235 042人。

反观我国，2010—2021年中职生资助投入增速缓慢，且2019年年均增幅为-23.74%。2021年，中职生资助投入占资助总投入仅有14%，地方政府和社会资助仅有9.79亿元和2.72亿元。根据图1所示，12年期间，中职教育生均资助额从1 544.03元上涨至1 772.43元，这表明我国中职生资助投入力度远远不够，地方政府和社会参与度亟待提高。根据《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2021年）》显示，中职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规模比为146%，教育经费投入额度比为203%。根据德国和美国职业教育资金投入标准，职业教育投入应为普通教育的两倍，即当中职与普高教育规模比为146%，与之对应的教育经费投入理应为292%[12]。相比之下，我国现阶段的职业教育经费投入额度还相差甚远。

（二）资助类型：形式单一，选择受限

多样的资助类型是充足资金来源的基础，是资助工作得以长效运行的保障。德国在资助类型、资助覆盖范围和资助额度上具有灵活多样和科学全面的特点，例如，德国设立专门针对双元制

表4　德、美、中在中职生资助上的差异分析

	投入额度	资助类型	资助方式	主体参与	法律保障
德国	投入力度大，主要经费来源于企业	类型多样，具有差异性和灵活性	专项专管，资助育人	主体多元化，企业参与为主	起步于1869年，主体责任明确清晰
美国	覆盖面广，资助额度大	类型丰富，企业积极参与	有效评估，问责机制	多元参与，良性循环	可以追溯到17世纪，法律体系完善
中国	投入不足，政府是经费投入的主体	类型单一，主要是以免学费和国家助学金为主	评价单一，缺乏系统性和民主性	主体单一，社会、企业参与性较低	正式起步于2006年，缺乏系统的法律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职业教育的学徒培训津贴和职业教育助学金。[13]《联邦教育和培训援助法》还针对25岁以下有才华的职业教育学生发放继续教育补助金，同时，政府对投资员工职业学位深造的企业进行税收减免。其完善的双重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使德国成为青年（15~24岁人口）失业率低于10%的经合组织国家之一。

美国针对中职学生的资助类型包括无偿资助、联邦拨款、佩尔助学金、州地方拨款、学校机构拨款、联邦贷款和其他贷款等。其中，前三种的覆盖范围极大，并且不同的贷款也有其丰富的形式，例如，学生贷款包括联邦直接补贴贷款、无补贴贷款等五种形式。[14]同时91%的美国企业为员工提供继续职业培训的经济援助，并且会提供6~7种不同形式的职业培训，公司越大，越有可能提供几乎所有的职业培训选择。[15]

我国对于中职教育虽推出了多种资助类型，见表5所示，但是主要是以免学费和国家助学金为主，2021年国家财政资金在中职生资助投入中占比98.34%。例如，位于浙江省宁波市的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2019年制订了《学生资助工作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其中仅包括学费减免、国家助学金、营养午餐、校服费减免、住宿费减免。杭州市西湖职业高级中学实行全校学生免学费政策，2020年全校共1 848名在校生，而春季享受国家助学金人数77人，获省政府奖学金86人，秋季推荐3人申报国家奖学金。我国资助类型往往仅限于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和助学金，企业和社会的投入寥寥无几，资助类型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往往更少，且受助比例较低。

表5　德、美、中在中职生资助类型上的差异

	德国	美国	中国
资助类型	学徒津贴	无偿资助	国家奖学金
	职业教育助学金	联邦拨款	国家助学金
	《联邦教育促进法》规定的资助	佩尔助学金	免学费
	住房津贴	州地方拨款	地方政府资助
	子女补贴	学校机构拨款	学校资助
	奖学金	贷款	社会资助
	教育贷款	联邦贷款	
	其他资助	其他贷款	

（三）评定方式：责任含混，资助失实

有效的资助评定方式，能够使中职生资助经费运用在刀刃上，大大提高资助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在德国，学校拥有极大的自主权，一个学生是否能够受到资助由校内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决策，形成了有名的多结构参与制。学生申领时有明确的部门专项专管，各部门责任清晰、分工明确，确保资助的真实性和可靠性。[16]

美国同样具有独特的资助评定方式，会定期对职业教育资助进行评估。《卡尔·帕金斯职业和技术教育法》规定在2002年之前完成对职业和技术教育方案进行独立评估和评价。[17]评估内容包括：①州和地方计划的实施；②联邦资助方案变化的影响；③教师素质和教师供求；④学生参与职业教育；⑤学业和就业成果；⑥雇主参与和对职业教育项目的满意度；⑦教育技术和远程学习；⑧责任要求对项目绩效的影响。[18]评价的关键因素包括联邦职业教育基金、学术表现、风险问责制度等，完善的职业教育资助评定系统是美国职业教育发达的重要原因。[19]

相比之下，我国资助评定过程缺乏量化考核，评定方式不科学。首先，资助评定往往以申请者生源地三级贫困证明为主，致使造假、“行方便”打造的虚假“贫困生”层出不穷，难以确保资助到真正需要资助的群体。其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学校往往以成绩为主要考核标准，学校资助工作小组主要是学校中上层领导，偏重资助的纸面数据，忽略实际效果。缺乏学生民主参与，使资助的推选和评定过程存在纰漏，结果难以令人信服，无法真正体现公平性和真实性原则。

（四）主体参与：保障欠缺，定位模糊

学校和企业密切互动，社会和市场高效参与是保障中职生资助投入源源不断的关键，针对性的法律是确保各主体踊跃加入中职生资助工作的保障。德国1969年《职业教育促进法》和《企业基本法》就明确规定企业、职业学校、地方政府及社会各主体对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责任和义务。[20]德国职教资助制度以“受益”为原则，企业成为投入主体，形成了公共财政与私营经济共同保障的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教育经费投入体系。许多企业为雇员在中职教育和培训学习中提供经济支持或让其休假参加课程。[21]同时,劳动力市场非常积极地融入职业考试系统和职业教育系统,商会也会向有需要的学生提供一定的资助和相应的预备课程。[22]种类繁多的资助投入,不仅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强了校企合作,而且形成了以企业资助为主,政府、学校、团体、相关部门、个人等多元主体主动参与中职生资助的大好局面。

美国职业教育资助同德国一样具有主体定位清晰和法律保障完善的特点,1917年《史密斯—休士法案》首次以立法形式向中职教育拨款,随后相继有《美国联邦职业教育法》《珀金斯职业和应用技术教育法案》《国防职业教育法》、"佩尔助学金"的颁布和设立。在有效的法律保障下,绝大部分美国企业不仅提供继续职业培训,而且提供多种就业途径,美国联邦政府、企业、社区以及私人个体等社会力量的投资和职业教育发展形成了良性的闭环系统。[23]

相比之下,社会主体参与积极性低、法律不健全成为我国中职生资助发展最大的阻碍,资助主体仅仅以政府为主,学校、社会参与微乎其微。而德国中职生资助经费85%来自企业,美国近九成的企业参与到职业教育资助。由此可见,企业和社会的参与是影响中职生资助发展的关键因子。而我国现阶段,国家财政投入每年占比均在90%以上,相关法律的缺失,造成了中职生资助是国家的责任,校企、社会却成了"局外人"的困窘局面。

四、"五化"赋能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资助高质量发展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在保障教育合理投入的同时,优化教育支出结构,新增教育经费要向职业教育倾斜。鼓励社会力量捐资、出资兴办职业教育,拓宽办学筹资渠道。"中职生资助与建设高质量中职教育体系存在密切联系,德国和美国在中职生资助上,积累了丰富的先进经验,不管是其充足的投入机制、多样的资助类型、明确的评定方式,还是多元的主体和完善的法律保障都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因此,本文结合我国中职教育实际情况,提出以下优化中职生资助的建议。

(一)加大政府投入,发挥政府资助"主导化"

政府充足的经费投入是中职生资助的动力之源,我国过低的投入额度和覆盖面无法保障中职生资助的充分发展。德国鼓励和支持"双元制"模式的发展,利用国家政策充分调动企业及各主体踊跃参与中职教育。美国政府不断调整各种理念的适应性和相应的资金比重,形成资助理念多元化、资助模式多样化、资金使用科学化的资助格局,从而吸引地方行业、企业、学校和社会各界共同加入中职生资助工作。[24]因此,我国政府在保证足够投入的同时,更应该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吸引多主体参与中职生资助。首先,政府应该加快出台相关政策法律,[25]例如,设立针对中职生的专项资助资金,明确责任主体,保证经费来源的稳定性。其次,政府实施相应的减税计划,对积极投入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进行税收减免,提高各主体的主动性。最后,引导企业资本,撬动社会资本,推动职业教育资助可持续发展,统筹政府资金和资源积极搭建平台,促进投资主体走上"投资—回报—再投资"的良性循环发展道路。

(二)丰富资助类型,推进资助类型"多样化"

多样的资助类型才能保障资助工作的稳定发展。目前,我国中职生资助的投入实际仍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学校和社会资助只作为补充,形式较单一,缺乏科学性。而德国资助类型多样,例如,助学贷款下还包含银行贷款,私人部门和社会机构借贷,为降低学生压力,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确定还贷时间。[26]美国在资助类型上更有其一套完整的体系,联邦提供各种方式的贷款,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体的主动参与也极大地丰富了资助类型。德国和美国这种分类合理、来源丰富、操作灵活的助学贷款制度对于我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必须积极调动社会各界主体对职业教育捐资助学的主动性,通过相应的税收优惠、绩效问责等方法激发中职生资助主体动力,形成学校、企业、社会团体、专门机构等针对中职生资助的专项资助基金,打破完全依靠国家财政资助的窘境,使资助类型趋于合理化和科学化。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三）健全评定方式，提高资助方式“合理化”

科学的资助评定方式能够使资助工作事半功倍，并提高资助的针对性和高效性。我国现行的中职生资助方式存在评定机制不健全，评定考察队伍组建不科学，评定过程缺乏民主性等问题。德国的多结构参与制确保了资助工作的高效运转，美国独具特色的资助评价体系保障职业教育资金得到最优配置。相比之下，我国亟待建立系统的、科学的资助评定方式。[27]首先，我国应建立严格的评定审查机制，及时跟踪和更新贫困学生信息，对申请者提供资料的真伪性、可靠性进行严格筛查，绝不漏掉一个应该帮扶的贫困学生，绝不浪费一个资助名额给不符合标准的学生。其次，建设专业水平较高的资助评定人才队伍[28]，确保资助工作的高效进行，做到公平公正。最后，提高资助评定工作的民主性，加强民主监督，提高学生代表参与资助评定和考核的比率，坚决遏制造假、拉票、偏袒等情况的出现，只有如此才能保障资助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四）统筹资助主体，促进资助主体“多元化”

企业、私人团体、社会等多主体投入和相互协同是保障中职生资助工作良性向好发展的关键。合理的职业教育资助经费模式应以企业为主，政府、机构和其他投入为辅。[29]企业作为最大受益者，理应成为职业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德国和美国能够保障中职生资助的充分投入原因在于他们始终秉持“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30]而2021年，我国中职生资助中社会投入仅有2.72亿元，占资助总额比仅为0.85%，亟待打破这种政府投入为主体的窘困局面。各主体乐于参与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完善的法律做支撑，只有积极引导企业与职业院校广泛合作，发挥政府的杠杆作用，鼓励企业大力投资中职教育的发展，明确划分企业以及社会各界在促进中职生资助发展上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大力开展校企共建、互融互通的新模式，才能形成以企业为主，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人共存的多元资助体系。

（五）完善资助法律，发挥法律保障“有效化”

有效的法律可以起到极好的保障和规范作用，让中职生资助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是明晰各主体有效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金刚罩”。德国的职业教育在法律保障上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在1969年《联邦职业技术教育法》就明确规定了企业对职业教育办学的责任和义务，2005年《联邦职业教育法》又做了进一步的细化，更加明细了企业的参与细节。[31]类似的，1994年，美国在《从学校到工作法案》中就提出校企合作兴办职业教育，并详细规划双方的责任。我国发布的政策文件虽有相关方面的涉及，但是规定模糊，主体责任划定不清晰，义务分配不明确。我国应加快出台相关针对性法律，严格落实各主体对于中职生资助的责任和义务，只有将相关责任和义务提升到法律的高度，才能保障稳定的资助投入、多样的资助类型、高效的评定方式和各主体的积极参与。

参考文献：

[1]何朝峰，刘雪珍.河池市中职贫困生资助方式的偏好研究[J].教育评论，2014(3)：129-131.

[2][29]蒋百平，付安.对中高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衔接的思考[J].教育与职业，2019(18)：109-112.

[3]张海，洪银霞.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资助体系建设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2，33(28)：49-53.

[4]田志磊，黄春寒.中职教育学生资助政策评估报告[J].教育学术月刊，2017(11)：3-19.

[5]薛瑞英，谢长法.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中职学生资助政策的演变与展望[J].教育与职业，2018(17)：36-41.

[6][20]王继平，尉淑敏.新世纪以来我国中职学生资助体系建设的回顾与反思——兼谈德国经验的借鉴[J].职业技术教育，2021，42(18)：25-31.

[7]郝天聪.责任伦理视角下中职学生资助制度的伦理困境与反思[J].教育与职业，2017(3)：36-42.

[8][13][16][28]陈晨.中等职业教育“资助、免学费”政策分析[J].教育科学论坛，2019(21)：29-32.

[9]张文静，冉云芳. 21世纪以来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及影响因素分析[J].教育与职业，2021(4)：32-39.

[10][18]王慧文，钱俊.德国职业院校学生资助体系的特色提炼及优势借鉴[J].教育与职业，2020(7)：93-97.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1]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2019[EB/OL].[2022-08- 13].https://nces.ed.gov/programs/di?gest/d19/ch_4.asp.

[12]吴青松,刘群,巫霞.职业院校全面开展职业培训的困境和出路——基于英国、德国职业教育培训立法的启示[J].成人教育,2020,40(10):84-89.

[14]BAIRD M D, ENGBERG J, GUTIERREZ I A, et al.RCT evidence on differential impact of US job training programmes by pre- training employment status[J]. Labour economics,2022(75):33-52.

[15]IRYNA LYTOVCHENKO. Role of adult learning theor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Training in the USA[J]. Future human image,2016,6(3):67-80.

[17]National Assess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NAVE)[EB/OL].[2022-08-10].https://www2.ed.gov/rschstat/eval/sectech/nave/in ?dex.html.

[19]PETR H, LUCIA K, STANISLAV J, et al. Career adaptability and social support of vocational students leaving upper secondary school[J]. 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2020,28(3):478-495.

[21]高佳.德国职业教育资助制度的三大支柱[J].职教论坛,2011(28):89-91.

[22]FAZEKAS M. A skills beyond school revi ew of Germany[EB/0L]. (2019-08- 25)[2022-08-10].http://dx.doi.org/10.1787/9789264202146-en.

[23]FUX. Research on effect and model of university funding and educa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P].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th and engineering,2020.

[24]KATARINA, ALPON S.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al financing, career guidance, student learning motivation, learning discipline on readiness to enter the World of Work on students senior high school in Padang City[P]. The fifth Pada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s educatio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accounting and entrepreneurship (PICEEBA-5 2020), 2020.

[25]贲能军,顾建华,冯晓峥.职业院校精准资助工作体系的建构与应用[J].教育与职业,2020(6):48-51.

[26]肖凤翔,商家齐.德国大学生奖学与助学政策研究[J].当代教育科学,2017(8):75-80.

[27]温嫦艳.角色理论视阈下的高校学生资助工作人员角色重塑——评《高校资助育人的探索与实践》[J].当代教育科学,2022(3):2.

[30]邱恬,邱小健.我国职业教育学生资助政策的变迁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J].职教论坛,2021,37(10):78-84.

[31]年艳,潘建林.美、德、日三国职业教育经费筹措机制比较及启示[J].职业技术教育,2019,40(12):67-73.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编辑部投稿声明

近期,我们收到多名作者投诉在网站投稿本刊被要求交纳审稿费后论文没有发表的问题。为保护作者利益和本刊声誉,特作如下声明:

1.本刊不收取任何版面费及审稿费,若投稿作者收到缴纳相关费用的通知,均系盗用本刊名义实施诈骗。

2.本刊投稿方式为电子邮箱投稿,唯一指定专用邮箱为cvate1632@vip.188.com。

3.本刊并没有开通网上投稿系统。网上出现的http://zgzyjsjy.qikann.com/,www.zgzyjsjy.cn等网站均为假冒网站,请作者不要上当受骗。

4.查询本刊信息,请登录“中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www.cvae.com.cn)。

(C)1994-202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